

第六章 合浦出土的金银、宝玉石串饰与微雕

四、海上丝绸之路视野里的串饰与微雕

(一) 文献里的路线

贸易是汉代中外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推进了汉帝国的扩张，不过南北方的贸易方式差异相当之大，北方处于陆路的边境贸易，南方则侧重于海上贸易。有关公元纪年前后的文献《汉书·地理志》留下西汉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记录：“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84]

这里有关地名的对应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解答，目前的通行研究指向：“都元国”最早认为是苏门答腊岛北岸的某个地点，后被认为在中南半岛南部某地，或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的大型城邑；“邑卢没”是缅甸南部萨尔曼河口附近的阿尔曼尼亚(Arramaniya)；“谿离”是缅甸的南部伊洛瓦底江的布干城(Pugan)；“夫甘都”是伊洛瓦底江下游左岸的塔格翁城(Tagauung)附近；“皮宗”或是马来西亚西南端的普罗皮珊(Pulaw Pisan)岛；“已程不”是印度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斯里兰卡的锡兰(Ceylon)；而最有争议的黄支，似乎是印度东南部的坎基维拉蒙(Conjieveram)。这些具体到行驶方向、日程、风俗的记录，完全可称为南海贸易指南。这些贸易又有隶属皇帝“黄门译长”掌管参加，似乎能说明远在长安城的皇帝本人及内府积极参与了对南海及印度诸国的海上贸易。中国利用黄金和丝织品换取明珠、琉璃和奇珍异宝。这里最早提到将中国内陆产出的丝织品，作为间接交易的主要商品。在稍晚时期，中国人甚至十分清楚，印度及西亚的商人利用海上贸易所得丝绸，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85]

当然这条海路的交往是相互的，到东汉时期逐渐分担了陆上丝路作用，成为重要的官方交往的通道。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国使第一次通过日南到交趾郡一路航行到中国南部，再步入内陆的国都洛阳；东吴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罗马商人秦论也按此路线抵达东吴。同样在西方文献中，对1世纪前后的罗马在印度洋周边活跃的贸易有着清晰的记载^[86]，这些均表明中国与罗马之间民间的海上贸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本章第三节中从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角度探讨了南部中国海沿岸海路的繁荣，但如果从大的时空背景来看，自西汉一王莽末期到东汉初年的数十年间，匈奴自北南下、西羌自南向北夹击，汉帝国暂时失去了对西域的管控，传统丝路阻塞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增强了中西亚的商人南下取道海路的信心，陆路贸易的断绝直接刺激了海路的畅通与繁荣。上文中所列举和分析的合浦郡周边汉墓串饰与微雕的发现情况，最繁荣和集中的时代也正正当此时。

东汉帝国对于南部日南、交趾郡据点的牢牢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海上贸易利益的驱使，其中交趾郡以特产、转运珍奇异品而著称。史料曾记载汉明帝时期的郡守张恢在任上贪污巨万，被告发后处以极刑^[87]，想必这种犯罪一定是出于当地贸易经济的繁荣。因此，上述这两个环绕大半个中国南海的据点，对于帝国疆域南扩、经济对海洋的延伸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当了帝国与海洋国家之间交往的纽带。

不过由于早期材料较少，特别是关于中国南方海上贸易的文献零散，使得从印度洋到中国南海沿海的考古发现，逐渐成为重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下面需要重点介绍的。

（二）中西亚路线上的发现

自合浦港南下，经过北部湾，再往南就是南海以及广袤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在这些半岛和群岛上，珠饰的制作和贸易由来已久。如果说环太平洋西岸的玉作传统一直有所传承的话，此地从贸易出发的珠饰制作可能便是基于此。以中国南海为基点，由近至远的排列：越南南部、泰国中部都是在公元几世纪前后十分活跃的珠饰与微雕制作和贸易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仅是各类串饰的原料产地，也是其中部分的初加工地点。因此，串饰也是南亚次大陆与东亚之间互动的文化桥梁。

越南早期文化显示，越南北部受汉帝国所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管辖；南部沿海尤以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地域文化显著。近年考古发现，如故日南郡今岘港一带遗址，出土批量的多棱肉红石髓串饰、卧兽与鸟禽微雕，同类品已在合浦汉墓中发现过。^[88]

沿中南半岛向西有一条狭长的大陆伸入海洋，通常称之为马来半岛。在马来半岛中部，即泰国领土的狭长中部一带考古发现了一系列的大型古代城址，如三乔山、差那港、三佛齐山（东岸地区）、金山镇、邦贵（西岸地区），其中的三乔山遗址最为著名，其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串饰与微雕，其中不乏玻璃和半宝石半成品遗物，显示出加工作坊的地位。地中海希腊化、南亚印度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各类文化因素在这里汇集，这些遗址也成为连接白东岸泰国湾至西岸印度洋间贸易网的站点。

伊洛瓦底江注入印度洋，沿河此时分布着骠文化，受海洋贸易的影响，该文化以制作超长条形蚀刻管珠串饰及走兽微雕闻名，玻璃制品有环和臂钏。^[89]不过这些较泰国那些

串饰来看，汉帝国域内几乎不见骠的文化遗物，或许其风格并不为汉帝国所能接受。

南亚次大陆的南部，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记录的末端。阿里卡梅度是印度著名的海港遗址，是近东与远东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榴子石串饰，最近检测表明，合浦出土的石榴子石在矿物结构上与其有着共同性，此地应是来源地之一。

两汉与南海的贸易，通过上述这些点和线间接或直接地关联在了一起。如果按中国南海周边季风区和洋流分布规律，笔者推测自合浦出发的贸易船只可利用北半球的冬季东北季风启航南下，至夏季可利用夏季西南季风和台湾海峡暖流返航。不过航行路线和航行周期比想象的情况要更加复杂。

（三）材质、形制、加工及文化内涵

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次大陆航线上的发现，可以说明公元前后几世纪之内南海丝路珠饰贸易的繁盛。通过考古发现，这些串饰与微雕的原料产地、制作地点、加工技术等问题，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泰国和印度是南海珠饰的主要产地和制作中心。泰国的制作中心位于马来半岛狭窄处，即三乔山、差那港、金山镇、邦贵等处。它们均东临暹罗湾、西傍安达曼海，这里也是东亚海与西亚海便捷的陆上管道（图 6-30）。



图 6-30 泰国中南部制作珠饰与微雕的港口城市

三乔山位于马来半岛东岸靠北部，所见珠饰以半宝石和贵金属珠为主要质地，其中有缠丝玛瑙、肉红石髓、玉髓类、水晶、蚀刻类，而琉璃珠数量很少。造型以管珠、多种造型微雕为主，微雕有兽、鸟禽、摩羯、三宝珠；黄金珠设计造型多样，也见到与中国南方发现的多面珠形。差那港偏南，主要发现的是半宝石珠和琉璃珠，其中半宝石珠以缠丝玛

瑙、水晶和肉红石髓为主，造型多见多面菱形、圆珠、扁圆珠、鼓形短管和两端磨凸珠等；琉璃以蓝绿色的微小圆珠为主；微雕与三乔山所见的类似，有极少量的贵金属珠饰。金山镇在差那港对应的暹罗湾西海岸，此地因出土贵金属串珠饰品而著称。发现肉红石髓圆珠、橄榄形珠并有少量微雕等，琉璃珠多以独特的黄色小圆珠为主（图 6-31），重要的是发现了融化的琉璃块，表明该地的作坊性质。邦贵在金山镇稍偏南的海岸，半宝石串饰为主，并见缠丝玛瑙、水晶、蚀刻等珠及不少微雕类（少见肉红石髓质），贵金属珠饰中见有多面金珠。



图 6-31 泰国中南部差那港出土的珠饰

在上述四处地点，均发现了串饰的原料以及大量的半成品。学者们认为这些地方也许是专门生产外销产品的重要制作、精加工的集散地。其中，三乔山可以确定是肉红石髓、缠丝玛瑙珠饰的生产地，但蚀刻可能是进口产品；而差那港发现了生产玉髓、水晶的大量半成品（图 6-32），说明其为串饰成品的产地。上述两地中的部分原料并不是当地特产，或是来自更西方的贸易，或是暗示与更远的西海岸原料产地的供需贸易。



图 6-32 泰国中南部出土的串饰宝石原料及半成品

众所周知，南亚次大陆南部及斯里兰卡是半宝石和宝石的集中产地，如缠丝玛瑙、无色的石髓、石榴子石、品质优质的绿柱石等。而印度本身白青铜时代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城邦国家就开始制作肉红石髓、蚀刻珠饰以供应近东两河流域及埃及的奢侈品消费。如著名的乌尔王后墓中，就出土了大量肉红石髓串饰。伴随着两河地带考古材料的公布，我们知道在该地动物形和人物形的微雕、串饰也与珠串同样盛行（图 6-33）。而在中亚、西亚的贸易互动中，中亚优质的珠串矿物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当地微雕制作的繁荣。

随着南亚次大陆两北部宗教（主要是佛教）的兴盛，社会对串饰的消费需求提高（图 6-34），原本的串饰产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至公元前后几世纪中，印度沿海以串饰制作为主要手工业的港口骤然增多。同时，串饰海上贸易的网络已向远东成功拓展。串饰制作技术和造型观念也同时在向外输出，与印度相隔大洋的泰国发现并不属于当地出产的矿物原料和大量半成品也即是证明。



a. 西亚动物形微雕和串饰[叙利亚布拉克(Tell Brak)遗址，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



b. 西亚人物形微雕串饰[叙利亚布拉克(Tell Brak)遗址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

图 6-33 两河流域早期串饰和微雕



图 6-34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造像、串饰和微雕（公元元年前后）